

论交流美学的理论谱系与建构路径

王委艳*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 20 世纪重要美学理论中有关“交流”的美学思想,提出建构“交流美学”的可能路径。20 世纪西方美学有一个重要的隐形线索,即符号学美学、形式美学、接受美学等都将交流作为文学的核心品质(瑞恰慈),或者将之作为交流境遇中的重要参照。交流美学的建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更新观念、重建范式、理论系统建构、文本实践等几个方面建立系统的交流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

交流美学 理论谱系 建构路径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梳理 20 世纪西方美学中有关“交流”的理论思想,提出建构“交流美学”的可能途径。交流美学的建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20 世纪以来,符号学、形式美学、接受美学等均涉及交流思想,但均不成体系。新世纪以来,无论在学术研究界还是在科技界,综合性研究越来越成为潮流。数字化、多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深入发展,交流、互动已经成为趋势和各领域的存在方式。在文学、艺术领域交流互动已经成为常态。从交流角度思考美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 王委艳,男,1977 年生,河南内黄县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符号与传媒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符号叙述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交流叙述学”,编号 19FZWB049;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建构交流美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符号学美学：皮尔斯“交流目的论”与米德“符号互动论”

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是符号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其最基本的符号学思想是其符号的三分构造：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皮尔斯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做这样的描述：“我将符号定义为任何一种事物，它一方面由一个对象决定，另一方面又在人们的心灵中决定一个概念；而对象又间接地决定着后者那种决定方式，我把这种决定方式命名为解释项。”^①这种“三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流关系，三者相互交流、影响而不能单方面决定意义。对于符号交流皮尔斯列出了交流的条件：

- (1) 必然存在一个发送者和一个解释者。
- (2) 必然存在着某物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交流。
- (3) 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交流的某物必须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它能够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建立起某些共同解释项。^②

这显然是符号交流的最基本条件，其一是要有交流主体：发送者和解释者；其二是交流媒介物：“某物”；其三是成为媒介物的条件是在交流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同解释项”。也就是说，共同解释项是交流主体能够交流的条件，因此，李斯卡认为：“当被交流符号能够把发送者与解释者‘焊接’在一起时，交流就发生了。”^③以此为基础，符号交流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显然，交流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在交流参与者中有一种共同的意义建构，交流的目的显然是把这种共同意义予以固定化，或者说形成“共识”。因此，皮尔斯认为，交流的目的是“解释没有余地”，即所谓“零解释余地”：“意味着发送者与解释者的意义一致。”^④

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揭示了符号存在的基本事实，人类运用符号、创造符号、

①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② Liszka, James Jakób,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emeiotic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9.

③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第251页。

④ 同上，第253页。

用符号交流等所有的符号活动，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交流，还是人对物的“符号感应”，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超越符号获取意义，而不是将意义封存在符号之内，正如赵毅衡所说：“皮尔斯提出的每个符号的三分构造（再现体、对象、解释项），使符号不再闭锁在能指 / 所指构造中。”^① 符号交流的最终目的是释放符号携带的意义，并在交流中形成意义“共识”。

皮尔斯从符号三元的“解释项”发展为一种“零解释余地”的交流“共识”揭示了人类运用符号的本质，即表达意义，而意义是一种交流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交流而形成的各自的存在方式，从而形成某种相互联系的交流共同体。

美国实用主义和当代社会心理学创始人之一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从人与社会的交流互动的内在机制中建立了“符号互动论”。人类的符号交流已经超出动物性，其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是否能够用符号交流，而是在交流中表现出的自反性特征和规范调节能力。这种自反性构成了米德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所谓自反性就是人类在交流中能够反观自身，“把自己看成是客体”，站在他人的立场看待自己在交流中的符号表意效果，这样他才能在交流中取得皮尔斯所谓的意义“共识”。正如米德所言：“个体在其他那里引起一种反应的行动和姿态还应在他自身引起同样的反应。”^② 但米德显然并没有把“零解释余地”看做交流的最终目的，因为人类在符号交流中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义，而是有所不同，更何况符号世界本来就是人类的设计，且它并非是一个完善的世界，其发展动力恰恰来自符号交流中对“非共识”部分的调整，这种调整存在于参与交流的各方，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获取最佳的交流效果。米德从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的关系中建构了符号互动理论，从这种关系中我们发现，人类作为一种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存在，其心灵和自我的构建无不建立在交流之上，从而使交流成为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

二、形式美学“交流”思想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在 20 世纪西方文论中，开启文本—接受者交流关系研究并不始于接受美学，事

^① 赵毅衡：《回到皮尔斯》，见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序》，第 7 页。

^②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第 60 页。

实上，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以文本形式研究为主的理论派别，对于文本—接受者交流关系方面并非视而不见。英美新批评代表人物瑞恰慈就是如此。瑞恰慈认为：“批评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两大支柱是价值的记述和交流的记述”，“我们精神的根本构造主要决定于下述情况：人类置身于交流之中已有千秋万代，交流贯穿于人类发展的过程，甚至更早。精神的大部分显著特征是由于它是交流工具而形成的。一个经验非得形成之后才能进行交流，这毫无疑问；可是它采取现有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它可能非得进行交流不可。自然选择所强调的交流能力是压倒一切的”^①。瑞恰慈把交流看做文学作品的重要品质，以交流为基础，文学作品在历史的流程中自然选择，已经形成的经验就会通过这种选择而生存下来的文学文本中获得传承。

这里，所谓“自然选择”其实是一种交流性选择。自然，是文学艺术存在的自然，即进入“文本—接受者”交流领域的自然。这里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艺术家必须提供有价值的、出类拔萃的经验；其二，这种经验必须在与接受者的交流中获得有效释放。这无疑为接受美学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参照。瑞恰慈虽然没有明确接受者是文本的最后完成者，但他提出的“自然选择”，无疑将接受者提高到决定文学艺术文本命运的高度。接受者的选择无疑是这种“自然选择”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俄国形式主义虽然强调文本内部研究，强调文学性来自文学文本内部，但也同样无法割裂文本与接受者经验的内在联系，并以接受者经验为参照进行文本内部的文学性改造。如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创始人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的“陌生化”概念，“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一译陌生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无关重要的”^②。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就是让人们摆脱感觉的“自动性”，把人们从麻木的、习以为常的、已经自动化的感觉中解救出来，恢复对事物的新鲜感。可见，所谓“陌生化”，其参照系恰恰不在艺术本身，而是存在于艺术接受者的感觉。而真正的艺术品就是对人们“自动化”感觉的抵抗，以

① 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② 维·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托多罗夫选编，蔡鸿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新鲜的经验唤起人们的感受，增加感受的难度，延长感受的时间。由此可见，所谓“形式主义”其实是对于这个理论派别的不太恰当的命名。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无论如何强调文本内部研究，都无法真正摆脱来自接受者经验的反向塑造。交流，其实从另一角度建构了这些以文本内部研究标榜的理论流派。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以对话理论为核心建构自己的理论思想。巴赫金在谈到长篇小说话语的时候指出其杂语性质，即长篇小说是由多种话语混合而成为一个整体。话语和对象之间被各种社会话语充满，因此，话语不可能直接抵达对象，而是要穿越“稠密地带”，“那里是别人就同一对象而发的话语，是他人就同一题目而谈的话”^①，因此，话语对对象的描述是各种话语“围绕对象的社会氛围”^②所形成的对话，这是长篇小说话语“杂语”性特点，由“杂语”而形成的对话性是长篇小说基本的存在方式。这种“对话性”不但包括各种话语的一致性，也包括各种话语之间的“争辩”，正是在这种“杂语”对话中，作家完成了对艺术形象的塑造。

也就是说，长篇小说叙事话语是各种杂语的统一体，这种“杂语”的对话性并非到此为止，而是每一种话语都以得到回答为目标，话语的组织、结构均围绕获取回答作为其结构原则，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关系。即小说的话语本身的杂语性质使各种话语之间形成对话关系，同时各种话语又以获取回答作为组织原则，话语与回答之间也形成交流对话关系。由此可见，长篇小说的叙事就是一个组织完美的交流结构，对话与交流构成小说话语形式的基础。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独特性体裁的发现揭示了小说体裁中几种交流关系及其特点：

其一是作者与人物的关系。在“作者—人物”交流关系中人物具有独立性的一面，人物一旦被创造就会形成自己的灵魂，他反过来会对作者的创作进行干预。人物的真实性来自于在“作者—人物”交流关系中二者正确的位置关系，作者不能强迫人物作出让步或者扭曲其言语行为，只有二者处于平等关系时，作者才不能以自己的创作支配权强行左右人物的行为，他必须与人物展开对话和交流。

其二是小说中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复调小说是一个杂语体，或者说是一个辩驳场所，人物之间不会形成某种权力优势，他们都处于一种平等的位置，他们都会在一个整体中发出各自的声音与意识，而且是相互独立的声音与意识。这并不意味着人物之间没有交流，而是交流建立在各自充分发表声音的基础之上。“确立他人的意识作为平等的主体而非客体，成了决定小说内容（即孤僻意识的崩溃）的伦理

①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②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5页。

的宗教的基准。这就是作者观察世界的原则。”^① 这些“平等的主体”（人物）之间也不会存在支配关系，作者的这种原则实际上也为各种人物之间平等的交流关系奠定了基础。

巴赫金的“对话”美学思想为交流美学提供了一种“平等”的交流思想以及交流的方式。因此，对于交流美学的建构而言，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无疑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它使我们在思考交流美学中对于交流的意义生成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并在具体的交流中进行有效规避，从而追求一种把影响正常、准确的意义生成的因素减到最低状态的交流效果。

三、罗森布拉特：文学交易论

另一位不该被忽视的理论家是罗森布拉特（Louise M Rosenblatt）。当我们追溯接受美学的源头的时候往往将其归结为姚斯的宣言性演说。1967年姚斯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荣任罗曼语文学教授一职，在就职仪式上发表了《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提出文学研究的“接受之维”。但，时间再向前追溯近30年，1938年，美国著名文学教授露易丝·M. 罗森布拉特出版《作为探索的文学》（*Literature as Exploration*, 1938）^②一书，提出文本只有在读者阅读中，在文本与读者的合作中才能创造意义的观点。她“把读者与文本看做阐释过程中的合作伙伴”。罗森布拉特极大释放了读者在文本意义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她断言，文本多元化阐释的有效性不仅由文本塑造，而且更由读者打造”^③。

罗森布拉特曾经给出一个简明的公式：“文学 = 作品 + 读者”，（*Literature equals book plus reader.*）“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忽视任一方都是危险的”^④。罗氏认为：“阅读是一种交易（*Transaction*），是一种双向过程（*two-way process*），包含读者和

①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10页。

② Rosenblatt, Louise M., *Literature As Exploration*, 5th Editio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6.

③ 查尔斯·E. 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赵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④ Rosenblatt, Louise M., *Literature: the Reader's role*, in *The English Journal*, Vol. 49, No. 5 (May, 1960), p. 306.

文本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① 罗氏将阅读分为析出式阅读 (efferent reading) 和审美式阅读 (aesthetic reading), 认为二者是一个统一体, 分别对应于阅读中的公共性和私人性, “在阅读中, 当落入统一体中的析出一方, 读者选择更加公共的或者认知的要素占主导。相反, 如果站在审美立场, 选择性注意会导向私人情感、态度、感知以及信念那一半更多”^②。罗氏还区分了交易理论与新批评和读者反应理论的不同, 指出: “在析出和审美统一体中的读者立场观念, 和交易理论范式一样, 不同于传统的和新批评的方法, 也不同于所谓读者反应理论。”^③ 也就是说, 析出式阅读与审美式阅读是读者阅读的两个方面,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 读者会采取不同的阅读立场。这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交易”, 交易双方都不会以绝对优势控制对方, 双方都有各自经验, 文学就是二者交易磨合的结果, 缺少二者任一方, 文学都是残缺的。

在罗氏发表于1993年的这篇《交易理论: 反对二元论》的文章中, 捍卫并发展了她1938年的观点, 认为, 对于文学文本来讲, 作者和读者都参与了这种交易过程, “作者和读者都会在与文本循环往复的交易中抽取个人的语言/经验库存。作者和读者一起发展了一种框架、原则或意图, 这些或模糊或清晰地引导一种选择性注意, 导向一种综合的、有组织意义构成过程。这些相似性产生自极其不同的语境与环境。我们不要忘了作家面对的是空白的纸页, 而读者面对的是已经写就的文本。他们的创作和阅读活动是互补的也是不同的”^④。

罗氏清晰地规划两种不同的交易过程: 其一是作者式交易; 其二是读者式交易。这样, 围绕文本的交易过程我们可以绘制如下的交易图示:



相对于罗氏早期理论来说, 这篇写于1993年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作者式阅读”(authorial reading) 概念, 并指出在写作交易中, 有两种类型的“作者式阅读”, “首先是表达导向, 阅读用来检验已经写下内容来抵抗不断变化的内在意图; 其二

^① Rosenblatt, Louise M., *The Literature Transaction: Evocation and Response*, Theory into Practice, Vol. 21, No. 4, Children's Literature (Autumn, 1982), p. 268.

^② Rosenblatt, Louise M., *The Transaction Theory: Against Dualisms*, College English, Vol. 55, No. 4 (Apr, 1993), p. 383.

^③ Rosenblatt, Louise M., *The Transaction Theory: Against Dualisms*, College English, Vol. 55, No. 4 (Apr, 1993), p. 383.

^④ Rosenblatt, Louise M., *The Transaction Theory: Against Dualisms*, College English, Vol. 55, No. 4 (Apr, 1993), p. 384.

接受导向，通过潜在读者的眼光阅读文本。当把交流作为目标，第一种必须为第二种提供标准”^①。这样，罗氏就从作者创作到读者接受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交易链条。罗氏的交易理论勾勒了围绕文本、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交流关系，“作者式阅读”实际上是一种“自反性”的文本接受，它对于文本的交流预期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到文本的构成（包括取材、体裁、写作方式、写作意图等），并进而影响接受者的解读方式。这种交流循环往复、梭式累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继承、增殖、发展、淘汰。

四、接受美学：从接受史到交流史

接受美学创始人德国人姚斯提出“读者之维”的落脚点是文学史问题，与罗森布拉特的文学交易理论落脚于写作与文学教育显然是不同的。姚斯深感文学史的重要弊端是忽略了读者的作用。他指出“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②。“把文学事实局限在生产美学和再现美学的封闭圈子内，这样做便使文学丧失了一个维面，这个维面同它的美学特征和社会功能同样不可分割，这就是文学的接受和影响之维。”^③姚斯认为要建构一种“读者文学史”，他借鉴解释学视界融合概念来解释历代读者的经验积累过程，历代读者不同的经验传递形成“经验视野”的流动链条，后来读者的经验会与前代读者经验有一个融合过程，也有一个变异过程，正是在这种在融合中变异、在变异中发展的历史过程构成了文学史的接受维面。但并非任何作品都具有改变审美判断，并进而改变审美标准的能力，只有那些打破熟悉的“期待视野”并形成“新期待视野”并进而改变审美标准的作品才能做到。

姚斯在把文学的演变史置换成接受者的接受史过程中，显然是以文学自身的演变作为参照，没有文学自身的改变，接受者难以在没有接受对象的情况下获得持续

① Rosenblatt, Louise M., *The Transaction Theory: Against Dualisms*, *College English*, Vol. 55, No. 4 (Apr, 1993), p. 384.

② H. R. 姚斯：《走向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③ H. R. 姚斯：《走向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的经验视野的积累。“新作品的崛起以先前的或已完成的作品为背景，它作为一种成功的形式达到了一个文学时期的‘高峰’，被迅速地再生产并因而变得习以为常。直到最终，后来的形式破土而出，前者便成为一个文学日常范围中已寿终正寝的类型而无人问津。”^① 姚斯的这种形式变革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与“自动化”的转换如出一辙。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被严重忽略，就是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文学形式并非自动变革，其动力源依然来源于“作者式读者”的经验积累和创作变异。在历史的宏大视野中，通过接受者与作者身份的转换来获得经验的积累，这种积累经过“量一质”互变规则获得改变审美标准的力量。因此，从根本上讲，来自文本内外的、各种主体间多层次的交流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发展并改变了姚斯的“读者中心论”观点，伊瑟尔进一步认识到“文学作品是一种交流形式，它冲击着世界，冲击着流行的社会结构和现存的文学”。“分析审美反应，必须把它放到文本、读者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才能进行。”^② 也就是说，伊瑟尔将姚斯文学接受史变成了文学的交流史。这种改变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看清了文本经验与解释者经验在相互激发、交流中所形成的经验的动态积累过程。伊瑟尔进一步指出了文本与读者交流的内在运行机制，“文本自身的模式只是整个交流过程的一个方面，因此文本的保留剧目和策略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可资交流的框架，要想达成交流，还必须由读者在这个框架之内为自己构筑审美对象。因而文本的结构和读者对结构的理解活动便成为交流活动的两极。人们在阅读活动中达成的成功交流将依据文本在何种程度上作为相关物在读者意识中建构自身”^③。因此，文学接受活动不是一种单向过程，而是文本与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互动，是一种动态过程。

伊瑟尔同时注意到文学交流与社会交流的不同，“阅读不是面对面交流，一部文本在它和读者的接触中，自身不能随机应变。社会交际中相互作用的双方可以通过互相提问来确定他们的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偶然性，或者他们的想象在何种程度上为相互间经验的非经验性的鸿沟架设桥梁。然而，读者永远不能从文本中得知他的看法准确与否”^④。就是说，在文学阅读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不对称

① H. R. 姚斯：《走向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②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③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第127页。

④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第199页。

的，正是这种不对称开启了读者的能动接受模式，使文学艺术活动因这种不对称导致了经验增殖现象。笔者将交流划分为真实交流与虚拟交流，并认为，两种交流的经验反馈方式有根本不同。伊瑟尔的这种文本与读者交流的不对称性，与笔者的虚拟交流的经验交换方式具有相通之处。伊瑟尔的审美反应理论终于使接受美学走向交流美学的广阔领域。以此为基点审视叙述文本的交流过程，我们发现，叙述文本实际存在于交流叙述的过程之中，换句话说，只有在交流中，叙述文本才能获得某种存在形态，这种形态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不是稳定的，而是变化的，不是就此结束，而是有所传承。正如伊瑟尔所言：“小说之所以被定义为一种交流形式，是因为它给世界带来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被理解才能展示自身。”^①

五、交流美学理论建构路径

综合以上论述不难发现，20世纪西方文论无论形式美学批评还是接受美学批评，交流作为一直隐在的线索，而皮尔斯符号三元、米德符号互动论、罗森布拉特的文学交易论，以及尧斯、伊瑟尔文学交流思想等都把“交流”作为主客体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使我们思考交流在人类感性、审美中的存在意义，没有交流，即使简单的美感就不会存在。站在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的发展无论对交流采取何种态度，都没有阻碍交流作为文学文本存在的重要原则，交流构成了文学经验的“写—读”互动，没有这种交流，文学经验就无法完成继承和革新，建构交流美学已经成为一项紧迫任务。那么，交流美学的建构遵循什么路径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更新观念、重建范式、理论系统建构、文本实践”等几个方面建立系统的交流美学理论体系。

首先，更新观念。观念更新是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各种观念是既有的理论系统的存在依据，或者存在方式，也是划定理论边界的重要标尺。但思想也往往同时囿于其中不得开放，久之便形成理论壁垒。伊瑟尔在论述理论的多样性的时候指出：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且各不相同的理论呢？每一个理论都将艺术纳入到一种认知框架之下，而这一框架又必然对作品的理解加以限制。一种概念所遗漏的方面，往往会被另一种方法所吸纳，而后者当然又会产生本身

^①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第275页。

的局限，如此类推，以至无穷。^①

交流美学的理论建构正是需要打破原有的理论限制，更新原有的观念、认知，建立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交流美学认为，任何审美活动都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双向交流，其意义也是在交流中生成，因此，美是主体与对象交流中的共性认知，而且这种认知具有动态性、不稳定性和主体针对性。

其次，重建范式。范式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它们存在于教科书、课堂讲演和实验室的实验中。研究它们并用它们去实践，相应的共同体成员就能学会他们的专业”^②。也就是说，某种理论范式通过各种概念和标准，以及通过上述的各种知识传播途径获取其存在地位。但所有理论范式都不是一种万能钥匙，“理论作为一种范式被接受，它必须优于它的竞争对手，但它不需要，而且事实上也绝不可能解释它所面临的所有事实。”^③因此，当一种理论的解释力受到挑战的时候，打破旧范式，建构新范式就成为必须。人文学科理论作为一种“软理论”（库恩语），在数字化、传媒互联网时代，其有效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交流、互动变成常态，稳固的东西被打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交流美学正是调整文学、艺术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在不确定、动态、多元的状态下认识文学、艺术的价值。

第三，理论系统建构。一种理论的构建必须建立在理论系统之上。一些理论之所以具有传播力，具有业内的通行标准，按照库恩的解释，应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④系统性的理论建构是理论更新的重要步骤。交流美学的建构也离不开这种理论探索。以交流为视角发现，不稳定、动态、多元、交互等成为交流美学理论的核心特征，交流美学关照交流对意义的影响，同时，意义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不稳定因素：美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其四，文本实践。这是检验理论阐释力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发现、修正理论

① 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②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③ 同上，第14页。

④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8页。

不足的重要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实践，大量的理论实践首先说明理论的强大阐释能力，同时文本分析实践又可以对叙事理论提供验证、反馈、更新。叙述学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理论学界较活跃的理论，就是因为其文本实践，数量之多、队伍之庞大，远远超过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建构交流美学，在上述步骤的基础上进行文本实践，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

建构交流美学，任重道远。其建构理论的知识谱系和现实背景均已经具备，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积极有效的理论探索了。

On the Theoretical Pedigree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Communicative Aesthetics

Wang Weiy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ut forward the possible path of constructing “Communicative Aesthetics” by combing the aesthetic thought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important aesthetic theorie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is an important invisible clue in Western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that is, semiotic aesthetics, formal aesthetics and reception aesthetics all regard communication as the core quality of literature (Richards), or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 the situa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ve Aesthetic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needs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cative Aesthe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renewing concepts, reconstructing paradigms,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ext practice.

Keywords:

Communicative aesthetics, theoretical pedigree, construction path

On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Van Gogh’s Oil Painting *Peasant Shoes*

Li Chu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Van Gogh’s painting of *peasant’s shoes* has the origin of theology of Christian. It means people opening to the holy space via the putting off the shoes. Heidegger elucidates it to express art and space what is the main topic of his late time, Because the truth of being is existing as the place. This place deeply connected with the Sun, Because the Sun gives light and warm to everything. It’s the origin of time and space. In ancient Greek myth, Apollo is the god of the art. The Sun is a feminine noun in German, and the Woman peasant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Sun. We can understand Heidegger’s art thoughts more profoundly through the a-